

義烏文史資料

第一輯

政協義烏縣委員會秘書處編

一九八四·十二

目 录

记国民党——〇师在义乌放下武器·····	吴世春 (1)
记“南联”·····	王 刚 (5)
二十世纪前期义乌教育概况的回忆·····	刘文革 (15)
忆义乌民众教育馆·····	李尚发 (20)
民国时期我县新闻事业的片断回忆·····	陈乃熙 (23)
回忆《大成日报》·····	李尚发 (25)
《义乌民报》记略·····	楼望云 (27)
义乌县鼠疫流行始末·····	刘书臣 (30)
壬戌年水灾史料:	
壬戌年水灾情况调查·····	张威如 (39)
壬戌水灾目睹记·····	李尚发 (41)
壬戌水灾目击记·····	陈乃熙 (43)
义乌壬戌水灾(古体诗)·····	何 菁 (44)
壬戌水灾振济碑残铭·····	(45)
义乌红糖·····	县政协工商组朱新海等 (45)
青枣史话·····	黄乃斌 朱盛卿 (50)
回忆吴耀宗先生率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 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浙闽访问团” 来义乌访问·····	朱基明供稿 (52)
宋一新——我国近代史上一位爱国刚直 的士大夫·····	吴世春 (56)
数理学家陈槻传略·····	陈乃熙 (57)
杨效春先生传略·····	杨兴诗 (65)
赵龙文·····	章微寒 (71)
火烧香山寺·····	于新满等 (73)
封建迷信思想害死一群人·····	施 春 (78)

记国民党一一〇师在义乌放下武器

吴世春

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是义乌解放卅五周年纪念日。回忆三十五年前的这个时候，国民党第一百一十师在义乌放下武器的经过，对认识当时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巨大变化和国民党统治崩溃的必然性，是会有一定意义的。

一九四九年春天，义北区（包括当时的湖鹤乡、永宁乡、寺前乡、岩南乡、柳和乡、香源乡、友联乡、香山乡）建立了人民政权。同金义区、兰浦区、浦东区，同属金萧支队管辖的路北县人民政府（县工委书记李铁锋、县长季鸿业）。义北区成立区人民政府，有一支武装工作队。吴舜和担任区长，沈祥春为武工队长，我是代理指导员。四月后半月，我们遵照上级指示，着手进行民主建政，积极筹粮筹款，准备迎接解放大军渡江南下，解放义乌。

四月底，义乌县的国民党政权已基本瘫痪。五月初，国民党第一一〇师移驻义乌。这是一支淮海战役后重建的部队。原来的一一〇师，已在淮海战役时，由师长廖运周率领，于皖北双堆集前线阵地起义。后来由廖运周的弟弟廖运升受命重建，在长江南岸铜陵一带收罗逃过江来的散兵游勇以及地方土顽武装，组成这一支部队。到义乌时，这个师有八个团，相当一个军的建制（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曾应允给军的番号）。但是编制不足额，全部官兵约七千五百人，团以上军官都是军校毕业的，团以下的军官

则基本上是按带来人数的多少而委以营长或连长。武器装备很差，整个师只有四挺重机枪、四十来挺轻机枪，机枪和步枪样式庞杂，新式的很少。他们到义乌后，分驻在县城西门一带和西门外稠关、三里店等几个村庄里。

五月三日下午，几个一一〇师的士兵到张村、留雅出卖旧西装之类的便服。友联乡的工作人员以为这是他们抢掠来的，把东西夺下来，把人放走了。这几个人回去报告，就使师的领导人知道在县城西北确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活动。五月四日，义北区的干部和武工队在香山乡东河活动，召开各界座谈会，宣传形势，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午后，收到廖运升暗中经友联乡工作人员送来的一封短信。大意是说他们要“起义”，准备把部队立刻拉过来，要求面洽。当时我们对这支部队完全不摸底，但又不能不予理会。于是由吴舜和区长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写：来信悉。欢迎你们的这种行动。但我们需要请示上级，过几天才能告诉你们如何行动。谁也没有料到，当天晚上，廖运升师长就把部队拉过来了。

事后了解当时的情势是这样的：廖运周起义后，接受我党的指示，秘密派一个亲信经武汉过江到皖南，再到浙江找到廖运升，劝弟弟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廖运升也有心起义，但想等领到较好的武器装备后再行动。四月二十一日，百万解放大军渡江南下。五月三日，我第三野战军解放杭州，二野解放衢州。国民党当局原来命令一一〇师在义乌待命并发枪，这时又命令开到龙泉县去，并且布置装备精良的十六旅在后侧监视，随时可把一一〇师吃掉，十六旅的前锋四日已抵达诸暨牌头。客观情势迫使他们必

须迅速行动。因此，廖运升接到的虽然不过是一位区长用香烟壳写的一张便条，但认为已经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当晚就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起义”，投向人民。接着一一〇师全部人马就移驻山口富（青溪）、金山脚、万村、茂后等靠山的村庄，师部住在茂后。事后知道，十六旅了解一一〇师已经“起义”，立刻从诸暨折向嵊县方面去了。

这时，路北县长季鸿业从支队部开会回来，吴区长向其汇报后，决定先着该师派负责人前来谈判，结果来了一参谋长。我们提出要他们遵守的条件，他也满口“保证做到”。

五日，吴区长到师部与廖运升师长见面，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欢迎，同时向他们提出：一、学习并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行动听从我们调度；三、所有抓来的民夫立即全部释放；四、不准直接派粮派款，他们需要的粮食柴草由我们筹集供应；五、不准开枪扰民，等等。一共提了八条，他们表示全部接受。由于这支部队成份很复杂，廖运升能完全掌握的只有一个警卫营。其余有相当一部分是逃亡的恶霸、地主、流氓、痞棍之流组成的“还乡团”，思想顽固，驻在山口富的第三团，有两个营的官兵就是由这些人凑成的。他们不愿放下武器，五日晚上脱逃，并把赞成“起义”的姓刘的团长和另一个动摇的营也裹胁了去。这个团连夜仓皇逃往东阳方向，最后在闽浙边境被解放军歼灭。

当时义北区的干部和武工队员只有二十来人，长短枪不到二十支。我们既耽心一一〇师再有一部分部队哗变，

又考虑他们驻在县城附近，靠近铁路线，很不合适。因此，通知他们于六日移驻香山乡，师部住夏迹塘。又经与季鸿业县长商议，七日晚饭后，又叫他们移到浦东的古塘、钟村一带去。师部住古塘。吴区长带朱桂基等几名武工队员同他们一起行动。

五月八日下午四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二军卅五师自金华方向到达义乌，义乌宣告解放。当天晚上，我们区里就有三名干部进城，与当时负责城防政治工作的解放军卅五师政治部民运科长张志远同志会面。我们在介绍本地情况时，也向他报告了一一〇师的行动。九日上午，解放军派出一个营进驻湖门、下余山、三里店一带，对一一〇师采取警戒态势。下午，吴舜和同一一〇师的赵参谋长（是一个曾经被我军俘虏过两次的军官，对我党我军的政策有所认识）到义乌县城。卅五师首长在听了吴舜和的汇报后，即派区武工队员何志煜当向导，带赵某连夜回到古塘，命令他们按指定的时间和行军路线，移驻到义乌县城东面的赵宅、黄牌、下王、宗宅一带。五月十日早上六时开始行动，当天到达指定地点（有一个连留守在浦东，十二日才来义乌）。解放军有一部分驻在麻车、殿山、十里牌等处制高点监视他们。第二天，我们在县城新马路腾出几座民房，招待一一〇师的全部军官集中在城里住宿。其余的由解放军政工人员进行教育，一部分士兵编入解放军，不愿留的则发给通行证和路费，让他们回家。过了约一个星期，一一〇师即编遣完毕，廖运升师长等较高级的军官，则由解放军护送到南京。

五月八日一一〇师驻在古塘时，警卫营的一个排附带

两个人，到大桥头一口放生塘用手榴弹炸鱼。这既违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违反不准开枪的禁令。为了约束部下，廖运升亲手将这个跟他多年的小军官枪毙了，但事后又流泪。这件事，说明廖运升当时率部投向人民的态度是真诚的，以后人民也给了他以应有的礼遇。

一九八四年五月五日

记“南联”

王 刚

“南联”的成立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采取穿插分割、多路交叉并进的方式，大举侵犯浙东，打通浙赣线。五月廿一日（农历四月初七），从诸暨方向来的敌人经过义乌县城，并向西进到义乌、金华交界。廿二日，从东阳黄钱畈方向过来的一股敌军，经雅治街、赤岸、佛堂到义亭方向。

日寇侵占义乌，地方沦为无政府状态。大约是六月上旬，义乌南区出名的地方士绅有雅西的傅亦僧、赵宅的赵钦生、东朱的朱升铨、佛堂的何芸生、青口的王樟有等人，在白鹊寺召开乡镇长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义乌南区各乡镇联防办事处”（简称“南联”）。推选傅亦僧、朱升铨为正、付主任，赵钦生为经济组长，何芸生为自卫组长，王樟有为总务组长。以各乡镇原有武器为基础，分别组织自卫武装，维持地方治安。佛堂镇自卫队力量较强，有二十多人枪，队长楼国荣，沿江守卫。六月中旬的一天，敌人从义乌出发袭击佛堂，自卫队在江边抵抗，三名

队员牺牲，其余溃散。从此，敌人以道院山“莲社”房子当营房并筑了碉堡，另有少量敌人一度把守浮桥头，佛堂成为敌人据点。

敌军在南区的兵力

日军在佛堂安下据点后不久，浙赣线东段的日军已缩回到以白龙桥为前哨，据守金华、义乌。为保障浙赣铁路侧翼的安全，曾在南区投入大量兵力，最多时有千余人，后来逐步抽调他处。敌人安设据点，除了佛堂镇的道院山、浮桥头以外，还有环院、坑口、尚山、官亩山、杨鞍山、三丫塘等六处。

敌人设点据守后，兵力经常流动，扰乱乡间，需索更甚。地方为求暂时安宁，到处出现“维持会”以应付敌人。少数宵小投敌附逆，为虎作伥，趁机掠夺，作恶多端，谁惹了他们，被指为“游击队”就会遭受杀害。人民群众惴惴惶惶，强忍愤怒而又暂时无可奈何。“宁作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感叹是共有的，亡国奴实在不好当。

山盆村被烧毁

一九四一年日寇流窜诸暨并曾进入义乌边界，国民党的义乌县政府一度迁到当时的五指乡山盆村。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人进犯义乌前，县政府又搬到这里驻扎过一阵，敌军侵占义乌全境，才流亡到永康去。六月，日军在佛堂安下据点后，稽亭塘人丁良贤当了维持会长。丁曾在上海活动，是个颇为出名的流氓惯窃分子。他当了维持会长，死心塌地当汉奸，四处收罗爪牙打听消息，为敌人提供情报。义乌县政府驻在山盆村的情报就是由他提供的，敌军

派大股部队到山盆“扫荡”，也是他带路的。敌军突然包围山盆，这个六百多户的山村，除剩下五间一所房子外，全部烧光，群众的家具、农具、衣物亦同时被毁无存，受灾之惨，前所未见。入冬后，许多灾民啼饥号寒，生活极其困难。那时“南联”的经费系向各乡富户募集摊派，曾拨出一部分用于救济山盆的灾民，稍微减轻了群众的部分困苦。

丁良贤这个铁杆汉奸，在南区是人人痛恨。他布下的情报网确也起过作用。我参加部队不久就被他知道，把我的哥哥王仙山杀害。我听到消息，半夜回家奔丧，当即离开家中，第二天拂晓敌人即包围我家搜捕。丁良贤的存在，对“南联”也是大祸害，所以下决心除掉他，设法对他的活动经常进行监视。四二年十一月的一天，探悉丁逆带领一群爪牙从赤岸敌人据点回到佛堂。我带一个小组预先埋伏在田心附近的穿心凉亭里，将丁良贤及妻子、妻舅活捉过来，另外打死两名汉奸，缴到短枪两支。我们对丁严加审问，他供出被他收买的十多个情报人员名单。丁良贤被处死，分散各地的潜伏敌特也全部消灭。这次除奸活动，不但为山盆村和南区人民报仇雪恨，也给敌伪以重大打击，使他们的气焰有所收敛，不再象过去那样嚣张，肆意横行。

“南联”武装队伍的组建

开始时各乡、镇的自卫队系分散活动，没有形成有组织、较强大的力量。六月中旬佛堂镇自卫队抗敌受挫后，何芸生不甘示弱，奋起组织较大规模的武装，抗敌兼以自

卫。他一面拿出家藏的十多支长短枪，在桥下坑村集合佛堂镇溃散的自卫队员，又向各乡搜集武器，派青口的王铁吾（中央军校六期毕业的国民党旧军官）任中队长。这时我应何芸生之邀参加部队，何派我担任短枪突击队长。中队约三十人枪，最好的武器是一支手提式冲锋枪。突击队十多人，都是短枪，王龙也于此时带三支枪和一部分人参加，被编在突击队里。这时“南联”武装初具规模，并控制十二个乡镇中敌伪据点之外的全部地区。在永康的义乌县县长章松年，就给“南联”的武装委以“义乌县国民兵团自卫第一大队”的称号，大队长何芸生。算是县政府的队伍，但未给一枪一弹，也不派人员，不提供给养，因此，地方自卫队性质未变。秋收后中秋节前一段时间，何芸生率部队驻在当时求自乡的山南村。当时一股自称“第三战区奋勇支队”的武装，从浦江到永康方向去。到南区时，他们要求与“南联”联系，共同商量抗日。当何芸生推诚相见，招待他们住宿，他们竟乘我毫无戒备时，突然翻脸，强迫何芸生交出武器，结果缴走中队的全部长枪。

何芸生对此异常悲愤，决心重整旗鼓，坚持抗战，保卫乡土。他以短枪突击队为基础，更加广泛深入地在本地搜集武器。队伍驻在双尖山庙时，人员寥寥，粮弹均缺。敌人七、八个据点把南区分割成小块，部队活动比较困难，决定将重新收集的少数长枪隐蔽埋伏，短枪分成三拨，为造声势，都称为中队：第一中队长王刚，第二中队长王龙，第三中队长施瑞，其实每个中队只有一、二十人，十来支枪。活动范围也作了大体划分：一中队活动在佛堂、赤岸、倍力一带；二中队在江湾、王宅、何店一

带，三中队活动在青岩傅、徐村、陈村一带。主要任务是向殷富户筹款用以购买武器，镇压汉奸，削除敌人耳目。因为队伍中人良莠不齐，又不懂得讲究策略，因此也发生过一些违犯纪律、轻易杀人的行为。何芸生又亲自赴云和向省政府呼吁求援。何芸生曾任国民党的军官，泰顺县县长，在军界政界有一些关系，当时省保安处处长黄云沛，就是他在黄埔军校当区队长时的学生。他说服黄云沛并得到支持，从碧湖附近的大港头兵工厂购得六箱武器，其中有六挺仿造的捷克式轻机枪、十二支德国式二十响快慢机、十二个枪榴弹筒和一批七九步枪子弹，先运到永康塘西，然后再运回南区。有了这批武器，一九四三年春节后各中队都扩大了，实力较强，队伍象点样子了。

何芸生之死和朱升铨出任大队长

何芸生购回一批武器后，没有久住永康塘西村，而是不顾个人安危回到义门。一九四三年初夏的一天，何芸生在倍力召开中队长会议。会议尚未开始，就被佛堂据点出来的敌人所包围。原来这是王龙中队的三个外籍兵苗长生、刘德胜、周海云叛变投敌。他们由孝顺据点的敌人用汽车运到佛堂，即带敌人包围倍力。何芸生率领干部、卫士突围，其余人均冲出来，他不幸中弹倒地，叛徒向他劝降未遂而当场被杀害。

由于叛徒投敌，敌人掌握了“南联”的活动情况，加上何芸生牺牲，活动很困难。朱升铨通知全部武装人员撤到永康塘西休整。这时已是吕师扬当县长。他给“南联”武装以“义武县抗敌自卫总队第一大队”的番号（群众仍称“南联”，队伍性质不变），委朱升铨为大队长，我担

任大队附。王龙因扰害地方，随便杀人而由吕师扬下令处决。三个中队长是：第一中队长冯廉，第二中队长吴模，第三中队长施瑞。不久，队伍就回到南区来。这时，苗长生等三个叛徒匿居赤岸，在敌人情报组当差。行动小心，很少外出。一中队派人进入据点将苗长生、周海云打死，刘得胜逃到外地去。

朱升铨，浙江九中毕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北伐军到浙江后，任江山县长。一位姓徐的秘书是共产党员，“清党”时上级指名将徐逮捕，朱升铨资助他脱逃（这位徐同志解放后在华东局工作，曾邀朱去沪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又曾一度任河南禁烟专员。他几次做官，都没有敛财自肥，仍然家境清寒。他为人淡泊名利，沉默寡言，罢官回家，曾倡导集资在寺西坑垦山植桐。他在“南联”遭遇困难时，毅然受命出任大队长，以致因此而遭日寇痛恨，儿子被杀，房子被烧，他也毫不动摇，坚决抗日，直到胜利。

“南联”与第八大队的关系

“南联”主任傅亦僧留学日本，当过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国会议员。义乌沦陷后，他表现民族正义感，身边经常带一小包氰化钾（“三步倒”），一旦遇敌，宁死也不受辱。县城沦陷后，先是傅正福（“小讨饭”）当汉奸维持会长，敌人瞧不起他，又拉傅屏侯任汉奸县长。傅屏侯写信邀亦僧到城里，被他严词拒绝。后来，城里二十多名伪军会同驻赤岸的日军，包围雅西，企图绑架傅亦僧，结果傅越窗逃脱，未遭毒手，但腿部受重伤。这时，金东义西联防处主任吴山民写信派人慰问，并邀他到义西治疗。

傅亦僧到第八大队住了两个多月，和不少共产党人有过接触。他赞扬第八大队的战斗能力和生活作风，对吴山民也很敬佩，常称吴是奇才。

吴山民和第八大队邀傅亦僧到西区治疗，显然是共产党对“南联”的关怀、争取和团结抗日。四三年秋，由吴山民出面相邀，由朱元松来陪同王时泽（吴山民任义乌县长时，王在县政府任职，这时是佛堂区区长）和我到西乡与吴山民会晤。吴山民热情招待我们并介绍义西区人民团结抗日、安居乐业的情况。他对我们谆谆教诲，使我们受到很大教育。这也是共产党团结争取“南联”抗日的行动表现。四四年春季，由我代表“南联”，在金东让河街民主人士何茂钟先生家中，与第八大队大队长王平夷见面。当时讨论的，一是普璜乡（现在的杭畴乡）、肃田乡（现在的畝田朱乡）的归属问题。这两个乡在铁路以南，但习惯上属于西乡，一度两边都分派负担。“南联”坚持要将这两个乡划为自己辖区，第八大队以团结抗日为重就作了让步。另一问题是团结抗日，双方商定有事协商，避免发生冲突（编者按：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中共金华地委召开的抗日时期武装斗争专题座谈会上，当时义乌党组织的领导人江征帆、杜承钧同志，也曾提到第八大队曾派代表在让河街何茂钟家，与“南联”的代表会晤，协商共同抗日事宜）。其后“南联”也是信守互不侵犯协议的，没有与第八大队发生摩擦。实际上，双方活动地区有铁路封锁线阻隔，第八大队力量强大，又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任何人也不敢对之轻举妄动。当时，南区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我们是知道的。象朱恒卿这样比较红的党员，在国民党实

行白色恐怖时，朱升铨曾不止一次给以掩护。但是，由于当时“南联”领导成员思想上的局限，没有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和党领导的第八大队，也辜负了吴山民、王平夷等同志对我们的教育。

阻止日寇掠夺碓石

佛堂东边的塔山（云黄山）有优质的碓石矿藏。一九四三年夏季，日寇着手开采这里的碓石，派一个姓“那许”的日本佬当“佛堂碓石公司”的负责人，并配备一个分队的武装人员护矿。“南联”为制止敌人掠夺战略物资以支援所谓“大东亚战争”，派罗正彩（山西人）以民工身份进入矿内，而且得到日寇的信任。四四年九月下旬一天的半夜里，倾盆大雨，“南联”部队按照计划冒雨行动，一、二中队切断敌人通信电线，埋伏堵击可能前来增援之敌，三中队冲入佛堂碓石公司，里应外合，俘获全部护矿敌军六名（那许这时不在矿，未俘获），又抓到汉奸邵宝棠（“金华地区碓石总经理”），缴获轻机枪一挺、二十响木壳一支、步枪六支和一批弹药资财，我无一伤亡。从此，敌人没有再在那里开采碓石。邵宝棠被抓后，金华曾来人说项，愿出任何代价“赎人”，我们没有同意，把邵和六名敌军解送永康太平，吕师扬下令将邵宝棠枪决。后来听说，六名日俘由国民党军队接收，押送到浙南去，半路上夺枪反抗，当场击毙两名，有两名逃回武义碓石矿。

一九四四年冬季，“南联”曾配合并协助国民党的卅二集团军总部突击营，在义乌搞了两次爆破活动。一次是

在溪西桥头埋地雷，炸毁日军从赤岸开出的一辆卡车，炸死敌军四名。另一次在义亭站西边的傅宅附近爆破铁路，炸坏机车一辆。结果溪西、傅宅两村民房全被焚毁。正因为敌人以如此残酷的行动进行报复，所以“南联”很少主动袭击敌人。当然，力量悬殊，要保存实力，也是一个原因。

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春，日军为收缩兵力，南区除佛堂据点以外，其它据点陆续撤走，“南联”的活动余地更大。国民党的县政府由杨焜当县长，县政府从永康太平迁到廿八都尚阳来。杨焜把“南联”当作依靠力量，“南联”也保护、供养了他们。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联”部队虽然成份复杂，纪律不大好，但总算坚持到抗战胜利。这时，在义乌的日军尚未缴械，仍然踞守据点。汉奸伪县长黄克梧这时想同“南联”拉关系，派人带信出来要求会面。我们假意与他周旋，将他诱到徐村附近将其枪决。这一行动大快人心，临刑时围观者人山人海，许多人点香烫他（编者按：黄克梧是军统特务，实行所谓“曲线救国”，当了汉奸伪县长，意图是侦察义乌共产党军队的活动情况，胜利时捷足先登，为国民党接收作准备。“南联”不了解这种情况，在日军已投降而未撤、国民党将要来而未到的时候，为民除害雪恨，做了一件大好事。国民党有苦说不出，不敢为这个汉奸报复，就不了了之了）。

不光采的一页

四五年八月下旬，国民党廿一师进入义乌，扬言要对

义西这块“赤化”地区杀尽烧光。第八大队和坚勇队北撤，廿一师也奉命开赴内战前线，“清乡”任务就由地方包揽下来。国民党组织了一个“宣抚团”，县长石有统当团长，付团长朱升铨兼第一大队长，王瑞井为第二大队长，何维宁为第三大队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鹤松，民政科长骆善大、以及楼怀新的刑警队也在宣抚团里。在四十多天的“清乡”时期，曾捕了不少地方干部，以“登记”名义强迫他们作行政“自首”。“南联”部队在“宣抚团”中的行动不是很卖力的，因为既无公仇私怨，也没有人妄想或敢于借此升官发财。但参加了这个行动，实质上是执行了国民党“爱国有罪，卖国有赏”的反动政策，是“南联”历史上最不光采的一页。幸而当时“南联”领导成员头脑比较清醒，过去受过吴山民同志等的影响，没有在“清乡”时动过刑，杀过人，发现几个第八大队的伤员，也没有施加迫害而是悄悄让他们回家，才没有造成更深重的罪孽。

“南联”的结束

抗战胜利，国民党县乡政权恢复，“南联”宣告结束。一九四六年三月，部队缩编为一个中队，我担任中队长，其余人员按入伍时间，每年发一个月遣散费（约一百斤米）予以遣散。借用的短枪归还原主，一部分长枪发到各乡、镇保管，短枪大部为干部分藏。剩余的一部分经费，为何芸生进行殡葬，并在道院山建了三间平屋作为“忠烈祠”，以纪念何芸生和其他牺牲了的人员。

二十世纪前期义乌县教育概况的回忆

刘文革

编者按：刘文革同志是我县教育界的老前辈，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多年，是我县近代教育事业发展情况的见证人。他撰写的《回忆》，对了解、研究我县近代教育史有重要参考价值。深盼熟悉我县文教事业历史的老同志都能执笔撰写回忆录，即使只是某个片断也弥足珍贵。

二十世纪前期是指清朝戊戌变法到新中国成立（一八九八——一九四九）。这个时期，我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急剧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也相应地从忠君尊孔、封建迷信到提倡民主、科学、社会主义，同样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作者世代是义乌人，凡所叙述虽限于水平，未必完全正确，也不全面，但大都是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记忆所及，可供参考。

一、科举制度和县学

戊戌变法前，义乌传统的文化教育主要是封建主义的科举制度，是为满清君主专制、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对广大劳动人民，只有压迫、奴役和欺骗，称为愚民，没有文化教育。少数人在私塾蒙馆，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学点珠算，求能识字记帐而已。男子梳辫，女子缠足，有钱的还吸鸦片、红丸。没有民权、人权，也没有什么文化教育。对少数士人即所谓